

不平等的发展

〔埃及〕 萨米尔·阿明 著

与 长 增 济 经
发 展 理 论
书 丛

商 务 印 书 馆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不平等的发展

——论外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埃及〕 萨米尔·阿明 著

高钰 译

与 长 增 济 经

发展
理论



商 务 印 书 馆

2000年·北京

BÙ PÍNGDĒNG DE FÁZHǎN

不 平 等 的 发 展

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埃及〕萨米尔·阿明 著

高 钰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第 二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183-4/F·399

1990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张 12½

印数 4 000 册

定价：17.00 元

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丛书

出版说明

增长与发展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在以往,增长与发展这两个词并无语义上的明显区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将宏观的短期分析延伸为长期分析,于是产生了增长理论。增长理论强调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研究国民生产总值的因素与增长的途径。以后,随着附属国、殖民地纷纷独立,兴起了对其今后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吸收了增长理论的一些原理,但更强调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 and 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以及转变的途径和政策。至此,增长与发展两词有了不同的含义。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虽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但两者是密切联系着的。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又有向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迈进的宏愿。因此,我们既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要了解和借鉴国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论、政策和经验。这样,适时出版国外著名经济学者有关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中译本,便既是学界的殷切期盼,也是我馆责无旁贷的义务。

在学界的大力支持下,我馆自 60 年代以来已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有关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国外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30 年

来,集腋成裘,初具规模。但是由于这些著作过去均以单行本印行,印量小而分散,既不便于学界的考查研讨,又不利于学术的积累薪传。故此,我们从这些单行本中精选了一些重要著作辑成丛书,使其相得益彰,蔚为大观,以飨学界。

由于本辑著作都是在原有的单行本基础上辑选而成,版式格式难见一致,译文体例无法统一,对此尚希读者见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8年7月

译者序

《不平等的发展》是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的一部代表作。阿明发表过一系列论述非洲和第三世界经济发展道路、资本主义主要矛盾和帝国主义等问题的著作。1970年发表的两卷集《世界规模的积累》论述了帝国主义和不发达问题，本书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全貌，反映了作者关于发展问题的思想核心。

《不平等的发展》一书的副标题《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可以说明全书的主旨以分析不发达问题为中心。但本书不仅是作者对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的剖析，而且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南、北世界（即“外围”与“中心”）进行历史的和地域的纵横描述。这不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而是一部联系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学论著。全书的结构安排，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说：第一章旨在谈资本主义的起源；后四章谈社会主义的起源，其中二、三两章分别分析中心和外围资本主义的规律，第四章集中说明依附性问题和“不发达的发展”，最后在第五章里作者阐明了他对世界发展前景的看法。他说：“外围国家摆脱中心国家政治统治的每一个行动都导致冲突，而令人考虑到社会主义前景的必要性”。他认为，在全世界范围设想的过渡必须以外围的解放作为开端，真正的发展（而不是“不发达的发展”）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阿明从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出发抨击西方大国的剥削，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谴责帝国主义，他的学术思想不但在非洲和整个第三世界，而且在西欧、北美的学术界都有一定影响。

阿明是“依附论”思潮的著名学者。这一思潮在六十年代形成于拉丁美洲和美国,尔后发展到其他许多地区和国家。它主要从宏观方面探讨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批判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和发展理论,强调第三世界不发达的根源主要在于它受到来自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控制和剥削,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是统治—依附结构,在这种结构内,外围的发展只能是“不发达的发展”,不可能出现成熟的、自主的资本主义前景,因此它们如不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走向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摆脱其依附地位而获得真正的独立。依附论观点中维护第三世界利益的反帝反殖立场以及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等方面无疑是有益的贡献,但对战后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许多新因素和新发展的认识、对第三世界力求减少依附性和增强自主性的估计、对第三世界发展进程和发展道路的设想,在若干方面未免失之过偏。而且依附论学者中存在不少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多方面的论战和交锋持续不断。这一思潮是值得我国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所以,从研究依附论思潮而言,本书也是一部重要的著作。

阿明在1931年9月生于开罗,1957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57年至1960年担任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1960年至1963年担任马里政府计划化技术顾问,1963年起任教于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和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1970年起担任联合国非洲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1980年6月起担任联合国未来非洲战略局负责人。曾访问我国多次。

阿明的著述丰富,除大量论文外,重要的书籍著作包括:《马格里布的经济》(1967年),《象牙海岸资本主义的发展》(1967年),《现代马格里布》(1970年),《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年),《被封锁的西非》(1971年),《西非的新殖民主义》(1973年),《不平等的发展》(1973年),《非洲的农业和资本主义》(1975年),《帝国主义的

危机》(1975年),《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发展》(1976年),《阿拉伯民族: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1976年),《价值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1977年),《当代阿拉伯经济》(1980年),《在当代历史和危机中的阶级和民族》(1980年),《毛主义的前途》(1981年),《今日阿拉伯经济》(1982年)等。近著有:《对战后时期的再认识:一项学术历程》(1994年)、《全球化的挑战》和《资本主义的幽灵,对当前学术时尚的批判》(1999年)等。

本书此次重印,阿明特地为此作了中文版序,并进行中文版的出版授权。中文版序言中作者对本书出版以后的二十多年中世界形势的新变化进行了分析,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

为便于读者阅读以及了解本书的概貌轮廓,故译编了本书章节细目取代原仅有仅列章名的目录,谨此说明。

高 铨

1988年于北京

1999年补记

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新的挑战

《不平等的发展》中文版序

几十年前写的《不平等的发展》一书一直被认为是对依附理论的一大贡献。它说明“不发达”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并批判社会主义国家和激进第三世界国家想赶上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企图。我这两个观点至今并无改变。只是从那时以来历史已继续发展：资本主义进入了一场危机和全球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的和激进的经验垮了台。因此，外围各国人民和工人阶级正面临新的挑战。

所以，我在《不平等的发展》中文版的这篇序言里就要集中谈谈过去 20 年间出现的那些新问题。

我们看来都同意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已经过去。但我们也有别于主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不把这种变化归纳为“冷战的结束”。我认为，这种变化是由形成战后时期（1945—1980 年）生活与斗争的三种社会模式的垮台所界定的。这三种社会模式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苏联模式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与现代化计划。

“回复”到这些模式是不可能的，这种回复的愿望只是失去活动能力的集团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怀旧表现。“重塑”也无济于事，因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都已发生深刻变化，今非昔比。

我们看来也都同意我们过去 15 年间经历的发展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认为经济应服务于人民，而不是人民服务于经济。

这种发展可以相当简单地概括如下：我们谈到日益增大的社

会扭曲现象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前东方集团国家和南方国家中出现很大转折。贸易中重现大规模永久性失业,福利国家衰败,被排挤和贫困化的新现象已成为图景中的永久性特点。前东方集团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形势尤为显著。某些经济强劲的南方国家是少数例外,值得进一步研讨(但无论如何,这种例外是相对的,这些国家中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只是尚比较克制)。

我们不同意主导观点所说这种发展是“过渡时期必须付出的代价”,说最终会导向使人人受益的一种新型的、据说更健全、更强劲的经济。

可是,我们能不能说这种社会扭曲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扩张史上的一种新现象呢?或者说战后时代是这段历史中的一种例外,那是由于法西斯主义失败以后的大国关系比前更有利于劳动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呢?如果是那样的话,当前形势就是回复正常(即回复到马克思理论所说的积累与贫困化的法则)。

第三世界已分裂为新兴国家集团(它们已进入工业时代,甚至具备在世界市场竞争的能力)和贫困化的、被排挤的国家集团。具体来说:

(1)东亚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首先是马来西亚和泰国),加上中国,正在取得加速的增长率,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地方的增长率都在下降。这些国家(地区)都在积极地竞向世界市场提供工业产品。这些国家(地区)除了经济强劲以外,受严重社会扭曲的影响较少(这一点需要按各个实例加以界定和讨论),脆弱性较少(由于东亚所特有的地区内部关系的加强,程度上类似于欧洲共同体内部的情况),并且具有国家有效干预的特点,在推行全国发展战略方面起关键作用(即便这些全国战略转为外向)。

(2)拉丁美洲国家和印度的工业能力也是同等重要的。可是,

它们的地区一体化较差(拉丁美洲为 20%,而东亚或欧洲共同体为 60%),国家干预较不一贯。这些地区的增长率仍然较低,已很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的强化尤为突出。

(3)总的说来,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及伊斯兰世界仍然陷于过时的国际分工。它们仍然是初级产品出口国,这是由于它们没有进入工业阶段,或者是由于它们的工业脆弱无力、缺乏竞争力。这里的社会扭曲现象主要表现为贫困化和被排挤的人群大量增加。那里毫无地区一体化进展的迹象(非洲内部或阿拉伯内部)。增长实际上是零。虽然这个集团中包括“富”国(人口稀少的石油出口国)以及贫穷或赤贫的国家,但并不包括积极参与形成世界体系的任何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真正十分贫困化的。

区分活跃外围国和贫困化外围国,并不完全看它们工业生产的竞争力。还有一个政治差异。活跃外围国中的主导力量以及背后的整个社会(不论其社会矛盾如何)都有计划目标和实现的战略。中国、韩国的情况显然就是这样,某些东南亚国家、印度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较低程度上也是这样。

这些国家计划同帝国主义的计划相对抗,帝国主义目前主宰着世界,而这种对抗的结果将形成明日的世界。另一方面,贫困化外围国则既无计划(尽管诸如伊斯兰的政治讲话作出种种口头主张)又无自身的战略。其结果,它们的思想由帝国主义国家所左右,帝国主义掌握着为这些地区提出“计划”的绝对权力(例如非加太—欧经共联盟,美国和以色列的“中东”计划,欧洲含糊的地中海计划),这些计划事实上不受任何当地计划的反对。所以,这些国家都是全球化的被动对象。

这些国家集团之间不断增大的分野打破了“第三世界”的概念,结束了万隆时代(1955—1975 年)的共同战线战略。

可是我们将看到,对于如何评估资本主义在前第三世界国家

扩张的性质与前景,并没有总的一致意见。有些人认为,最强有力的新兴国家正处在“赶上”的过程,不再是“外围国家”了,即使它们在世界等级层次中仍处于中间水平。别的人(包括我)认为,这些国家代表未来的真正外围国家。中心—外围的相对,从1800年到1950—1980年间,与工业化经济和非工业化经济之间的对立相合,在今天则以新的、不同的标准为基础,这些标准可以通过对西方大国掌握的五种垄断进行分析来加以界定(金融全球化,技术创新,取得世界资源,通讯与信息手段,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贫困化地区的情况怎样呢?这种现象是否没有历史先例?还是相反地体现资本主义扩张的一种永久性倾向呢?(这种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权力对比较少不利于整个外围地区而暂时有所抑止。)有论者认为这种例外情况是由于第三世界——尽管组成的国家多种多样——在反殖民主义斗争方面、在有关初级产品的要求方面、以及在推行自身现代化与工业化(西方大国对此力图阻止)的政治意志方面的“团结”。正是由于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功不均衡,所以第三世界的凝聚力和团结力都消蚀了。

主导的意识形态声称“别无选择”,说世界各国人民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所谓理性和效率要求。我们认为,资本(即“市场”)必须被迫适应人民与社会进步的要求。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新东西是什么?

今日总的经济形势中的若干主要特点已经被界定并且得到认真研究。因此,我们如果勾画出最重要的那些特点,那就够了:

- 一、同一基本选择——新自由主义——影响了世界上几乎每个政府的经济政策。在西方大国和欧共体内部,这些选择涉及对确定目标的取消管制、更加放松劳工市场、对私有化不加限制(包括对传统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削减社会

福利支出、强调反对通货膨胀(以收紧银根政策和提高实际利率作支撑)、不加限制地开放国际资金转移,等等。在许多南方与东方国家中,这种选择由于实行严厉的“结构性调整”计划(在有些情况下实行所谓“休克疗法”)而得到强化。然而,这种一般性说明必须受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限定:那就是东亚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以及较低程度的东南亚),它们实际上没有参与新自由主义的游戏。这些国家(地区)实行了其他国家弃而不用的坚持一贯的工业化政策,政府干预对这方面的要求提供大力支持,所以实际上是“有计划的”。

二、全世界几乎每个国家都正在经历一场危机,而东亚再一次是例外。其征象包括:虚弱的经济增长(许多东欧国家和第三世界贫困化地区是零增长或负增长),生产投资疲软,失业率上升和就业不稳、同时“非正式”就业活动增加,等等。我们已经提到,伴随着这一切的是分配不平等的现象加剧。经济持续停滞,虽然官方仍在集中谈论“衰退”与“回升”。

三、出现金融化现象,即:短期、投机心理占了上风而牺牲了有利生产性投资的长期选择。

四、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国家政策也随之从属于这种无约束的全球化冒险,这由于基本的新自由主义选择而无法控制(灵活的汇率,金融自由转移,等等)。

这些因素加到一起几乎在各处造成发展速度各不相同的经济:某些部门、地区和公司(特别是大跨国公司)增长速度强劲,利润丰厚,而其他则处于停滞、后退或解体。劳工市场则四散分割以适应这种形势。

我们再问一句,这真正是一个新现象吗?还是一种多速度系

统，事实上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是常规的呢？这种现象只是在战后时期（1945—1980年）因例外的原因而有所减弱，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推行了有计划的政府干预（在福利国家、苏维埃国家和万隆时代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它通过组织地区间和部门间转移而方便了增长的普遍化和生产力的现代化。

这些变化至少在两个方面带来了决定性的长期效果：

一、大公司当然并不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新发展。但是，可以正确地指出，大公司演变的某些方面是新的。直到现在，大公司（甚至是跨国公司）首先是（特别就资本拥有者而言）全国性公司，其活动则超越了母国国界。为了公司的调度部署，它们需要本国政府的主动、积极支持。今天，它们已强大到可以不考虑（有时是反对）政府政策的设想来发展自身的扩张战略。所以，它们要政府政策从属于它们自身的战略。反政府的新自由主义论述掩盖了这个目标，把保护这些公司所代表的私人私益这一特有目的合法化。要求的“自由”并非人人享有的自由；是公司牺牲他人以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从这个观点来看，新自由主义的论述完全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和不诚实的。

二、另一个方面更加直接地关系到当前的技术革命，工作进程现在正发生极大变化。装配线生产（泰勒制）正由新的形式所取代，深刻地影响了社会阶级结构及其对工人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认识。这里我们也发现与劳工市场四散分割有关问题的重要因素。

金融化可以分析为危机的产物。过剩资本在现存结构下无法从生产系统的扩大中寻找出路，对统治阶级是一个严重的危险——资本大规模贬值的危险。所以，危机治理要求提供金融出路以避免这种最坏可能的结果。

高额利率、灵活汇率、第三世界与东欧国家的外债、美国的赤字、私有化与养老金金融化都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但是，奔向金融化并不是解决危机的出路；相反，它导致陷于停滞性螺旋之中，因为它使分配不平等更形恶化，并迫使公司玩弄金融游戏。就这个意义来说，金融化并不仅仅是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主宰的同义语；它还意味着各公司管理阶层把金融设想放在主导地位。

我们在上文各方面都可看到的东西方之间新的分裂，肯定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理论提出挑战。

“亚洲奇迹”值得大书特书。亚洲（或亚洲/太平洋地区）作为未来新兴的中心取代欧洲/北美主宰世界的地位，中国则作为明天的超级大国。

比较冷静地说，亚洲现象使人们认为值得认真关注，虽然我感到有些匆促。这些看法质疑世界资本主义扩张中固有的两极分化理论（这一理论往往不幸地混同于对“依附论”的庸俗解释），也质疑作为对付两极分化挑战的脱离战略。据说有证据说明赶上是可能的，而且认为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这更有可能实现（对这种论点的庸俗解释，这最终意味着出口导向战略），认为幻想式的脱离造成了苏联的灾难。

所以，内部因素，包括“文化”因素，可以说明有些国家成功地使自己成为积极塑造世界的一员，而其他国家则一败涂地，陷于违背自身意愿的贫困化和脱离主流的境地。

如果我们要在讨论这些复杂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进展，我们必须明确地区分对内部社会结构以及对世界体系中活跃力量的不同层次的分析。如果我们不想做不花力气、不得要领的论战，那么那样进行使问题明晰更为可取。例如，我认为苏联演变的原因主要是

由于该制度的社会选择(“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计划)。积极而有节制地参与全球化,同以出口优先为基础的经济战略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两者建基于不同的内部统治社会集团。东亚国家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它们使对外关系从属于内部发展——换言之,它们拒绝“适应”世界范围的主导倾向。事实上,这就是脱钩的定义,有些性急的读者把它混同于闭关锁国。

两极分化,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其他方面,没有一劳永逸、毫无改变地作界定。一个半世纪中由于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不同对比,它的表达方式也肯定变化了——这种对比事实上受到外围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挑战,迫使中心国家适应外围国家工业化(不管多么不均衡)带来的变革。这个事实能否以此肯定所谓东亚正在“赶上”中心国家的说法呢?这个结论未免操之过急。我在这里提出的论点导向非常不同的结论:通过西方大国五大垄断的行动,全球化的价值法则产生了新形式的两极分化,使得强大外围国家的工业居于从属地位。中国如果进一步结合进国际分工的话,也逃不脱这种演化。

关于欧洲建设的问题,也必须在这种全球架构内重新加以评估。我感到遗憾的是欧洲左翼内部对这些问题的辩论往往局限于欧洲的范围,或者最多是西方大国的范围。除此以外,只能听到一些善意的希望(特别是关于南北关系的主题)。

① 欧洲建设问题是作为一个共同市场计划开始的。在世界经济扩张阶段(直到1975年前后)中这项计划容易取胜,现在当资本主义进入结构性危机阶段后,这个计划就越来越困难了。我认为,超越共同市场走向多方面经济一体化意味着首要优先应是欧洲的政治一体化。可是,政治一体化同坚持本国现实相冲突,而且欧共体各国的左翼(以及右翼)在这个问题上有内部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优先实行共同货币(欧元,马斯特里赫特)可能促进必要的

政治一体化呢还是会造成欧洲各国间的矛盾爆发？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欧洲左翼内部讨论和意见不一致的热点。

② 在欧洲，新自由主义纲领是统治派力量赞同的（不但是右翼力量，而且是选举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党人，虽然他们的赞同有时有所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可能的社会抉择（在整个欧共体内建立一种新的、进步的社会和解）似乎不能提上日程。然而，关于新欧洲社会条约会是什么样的辩论却已开始，把这个辩论进行下去并且界定其战略选择及前景是很重要的。除了内容不确定的“奇妙”名称（“新凯恩斯主义”？）以外，事实上要的是什么呢？是不是 1，一种社会“堡垒式的欧洲”，还是 2，一种开放社会的欧洲（如果是这种情况，它应如何处理同美国、日本、以及外围国家的关系呢）？

③ 欧洲的统治利益（大公司），如同在日本和美国，把它们的战略界定在不受约束的全球化背景中。但在全球范围内它们并不是能向美国霸权挑战的活跃分子，也没有能力提出对南北关系的另一种看法。

④ 还有一点是，欧洲内部的新东、西关系自发地纳入了使东欧“拉丁美洲化”的架构，而不是把它平等地结合进来。东、西方的欧洲左翼力量会不会联合起来提出一个不同的战略以满足实现一个进步的、泛欧社会条约的要求呢？

⑤ 自由主义的选择和东欧的拉丁美洲化使得欧共体的内部平衡向有利于德国的方向倾斜。长期而言，“德国式欧洲”能够被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接受吗？同时，赞成本计划就使美国的全球霸权长存下去，因为德国如同日本，起的是在世界问题上同美国联盟的地区国家的作用。